

新
史
学
的
开
山

袁英光◎著

王国维
评传

王国维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学贯中西的

大学者，其学识博大精深，著述宏富，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在短暂的三十一年的生涯中，他先后从事哲学、

文学、戏曲、甲骨金文、古器物、殷周史、汉晋木简、

汉魏碑刻、汉唐史、敦煌文献以及西北地理、

蒙元史的研究，著述二百余种，在诸多学术领域

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是现代中国学术传统的重要奠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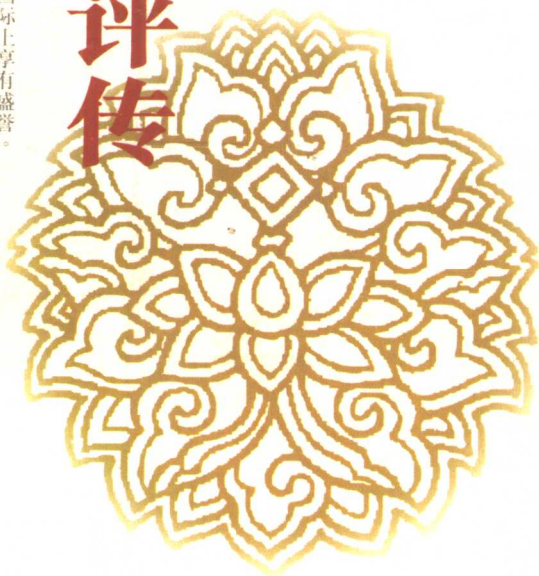
本书试图从王国维的史学研究出发，对其如何走上

史学研究之路及在史学领域各方面的贡献

作出实事求是的论述，以有助于读者进一步探讨

王国维的学术与思想。限于作者水平，书中评述不当之处，

尚恳请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新
史
学
的
开
山

袁英光◎著

王国维评传

上海人民出版社

特约编辑 陈丽菲
责任编辑 李 卫
封面装帧 陈红萍

新史学的开山

——王国维评传

袁英光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25 插页 5 字数 210,000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7-208-03102-9/K·724

定价 19.00 元

序、

郑学稼

袁英光教授的遗著《新史学的开山—王国维评传》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付梓。原上海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主任、现任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总编王界云同志打电话给我，约我为“评传”写一篇“序”，当时我正在南京大学公干，虽然极度疲劳，还是答应尽快应约。

从南京返厦门后，我立即阅读“评传”清样，伴随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激动，我几乎一鼓作气读完了全稿，既为王国维这位近代中国学术大师的心路历程而扼腕，也为袁英光教授倾注心血作“评传”的精神所感动。

袁英光教授是位唐史学家，也是国内研究王国维学术思想与成就的知名学者之一。李源涛同志写的“后记”，即有扼要介绍。他并非仅为写王国维“评传”，而作是书，他是经历了三十余年的研究、思考决定写这本“评传”的，虽然他生前未及见到是书的出版，但赖有弟子们努力，总算诚至事成。我在大学求学时就读他的文章，和他的交往是从一九八七年在常州召开“长江下游经济发展”讨论会开始的，会议主持人是南大的卞孝萱教授。记得我们三人曾在一起屈膝交谈，筹划合作写一部多卷本唐史。当时卞教授、袁教授都是我的师辈，能和他们合作，对于一个后学来说是何等兴奋的快事。可是翌年即闻他不幸患中风，合作之议

遂寝。九十年代，我到沪公干，曾去拜访他，他仍然热情地带我去见吴泽先生，并向我介绍他的一些研究计划，依然是“衣带渐宽”唯问学，一派乐观。往事历历，令人感慨百端！

“评传”的出版，为读者提供了一部全面评价王国维史学研究的著作，这对当前学术的发展和学风建设有着积极意义。王国维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而且深刻过人，所以如何评价，除了本书这样细致的分析之外，还有赖于相应学科专家的评判。我想说的一点体会是，袁师所阐发的王国维许多思想对今天的学者、读者仍有很大的启发。例如对王国维的学术渊源，一般读者或许因为他的著述多属深奥的文史之作，而认为他不过是“国粹”的化身，无大补于今日之学术。袁师的论述有助于消除此种误解。实际上王国维在上海东文学社学习时，既学日文，也学英文及数理化等近代科学知识。后又学德文。所以，他可以借助熟悉外语的便利，广泛阅读西方哲学，兼融中西，在治学（哲学、文学、史学）时广纳中外学术思想。近代学人的经历证明，凡有卓异建言者，无不中西兼融，博采众长，用今天的话说，学术上的创新往往来自学科交叉与中外兼融的学术优势。陈寅恪等大师无不如此。今天的学者（尤其研究中国哲学、文学、历史者）应牢牢记住这条经验。又如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有很高价值，陈寅恪即给予肯定，对于今天的学者来说仍然有参考价值，以免以后世之理论决断前世之史实，屏弃影射史学、实用史学，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历史事实本身的得失，昭示世人，在历史事实基础上，把握历史规律，体现历史唯物主义。再如王国维身上保留下来的“经世从政烙印”，“忧世伤生”情感，使这位学术巨擘在政治恐惧中不能自拔，而终至自沉于颐和园。王国维的悲剧也是中国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悲剧。历史的传统是一种动力，传统中堆积起来的包袱，却葬送了无数个天才。“书成付与炉中火，了却人间是

与非。”不能不令人深思。

袁英光教授的写作态度向来严肃不苟，他对王维国的成功与失败的经历，尽可能依据各种资料和已有的意见，进行逐一分析，远及上古史事考证，近及废清遗事，巨细不漏，精辟之论，灼然可见。有人说，严肃的著作都是作者用心血写就的，观于“评传”，极信斯言之不虚也。

谨此为序，并以此纪念故友袁英光教授。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九日于

厦门大学海滨东区点涛斋

前 言

王国维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其学识博大精深，著述宏富，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在短暂的 51 年生涯中，他先后从事哲学、文学、戏曲史、甲骨金文、古器物、殷周史、汉晋木简、汉魏碑刻、汉唐史、敦煌文献以及西北地理、蒙元史的研究，著述 60 余种，在诸多学术领域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是现代中国学术传统的重要奠基人。

由于个人性情、家庭环境和时代的原因，王国维一生都处于忧世伤生的困惑中。为化解内心的紧张，他转学多端，研究的学术论题频繁更换，并以其敏锐的眼光，勤勉的治学，在诸多领域获得了极高的成就。在中国学术界几乎无人注意德国哲学的时候，他率先钻研康德、叔本华等人的哲学著作，撰文介绍他们的学说和思想，并提出欲振兴民族和国家，必须研究高深的思辨哲学，这在晚清知识界普遍的功利主义气氛中可以说是罕见的卓识。他由西学返观中学，从艺术角度讨论《红楼梦》，开“红学”研究之新局面。又由吟诗填词而博览历代词曲，向国人奉献出名著《人间词话》，熔崭新的诗学理论于旧诗话体裁中，为建立中国现代的诗学体系作出了非凡的贡献。此后研经治史，上探三代，下及当时，凡所涉猎，皆有令世人瞠目的创获与建树。在传统与现代、西学与中学的冲突交融中，王国维以其过人的天资，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位以通人之资成就专家之业的大学者、大史家。

在史学研究方面，他以一系列新义迭出的论著，大大提升了现代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水准，开拓了众多学术研究的新领域。他在史学研究方面的各种考释、校注、跋论、专文、专著等，其中某些结论和观点，尚有待于学者们进一步研究，但大多论断，经过长期的学术实践检验，证明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不易之论”，为中外学者所信服和景仰。在史学研究方法上，他提供了综合比勘、相互参证、追根溯源、明其演化规律的治学方法。他将近代西方的实证论思想方法与中国传统的乾嘉考据方法融会贯通，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这种方法，不仅使他在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对当时及后来学者的治学思路有着极大的示范作用。他的史学研究成果之丰硕，识见之卓越，在同时代的学者中确实是不多见的，因而被郭沫若誉为中国“新史学的开山”。

本书试图从王国维的史学研究出发，对其如何走上史学研究之路及在史学领域各方面的贡献作出实事求是的论述，以有助于读者进一步探讨王国维的学术与思想。限于作者水平，书中评述不当之处，尚恳请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序	郑学檬
前言	1
第一章 博综诸学露峥嵘	1
一 新旧杂陈的启蒙教育	2
二 周游沪上习新学	8
三 融通中西哲学	12
四 重评《红楼梦》	20
五 教育、戏曲与词话	26
第二章 新证古史成宗师	34
一 避居东瀛治经史	34
二 在上海哈同花园	41
三 出任南书房行走	48
四 清华研究院导师	52
第三章 甲骨文与殷周史研究	60
一 殷商世系的考订	60
二 殷周制度与文化	67
三 商周史地之研究	73

第四章	敦煌学的拓荒者(上)	78
一	《流沙坠简》及考证	78
二	敦煌遗书的校勘	96
第五章	敦煌学的拓荒者(下)	108
一	于阗国史事考证	108
二	据唐写本考证唐代史实	114
三	据敦煌县户籍考证均田制	118
四	据碑文证补高昌、回鹘史实	123
五	研究音韵学和考证唐韵	128
第六章	汉魏石经之研究	135
一	汉石经的经数与石数	135
二	魏石经的经数与石数	138
三	魏石经的字体特点	141
四	《魏石经残石考》	143
第七章	精熟版本目录学	146
一	版本源流的梳理	147
二	《密韵楼藏书志》的编撰	157
三	佛经校勘与写本补史	162
第八章	校勘《水经注》	167
一	校勘聚珍本	167
二	广校《水经注》	172
三	丰硕的成果	176

第九章 研究匈奴史与蒙元史	182
一 匈奴民族的源流	182
二 蒙古史和元史研究	190
第十章 提倡“二重证据法”	207
一 “二重证据法”的产生	207
二 “二重证据法”的应用	212
三 贡献与局限	220
第十一章 自沉颐和园	226
一 感情与理智的矛盾	227
二 学术与政治的矛盾	229
三 “殉清”与逼债问题	233
四 长子之丧与挚友之绝	238
五 政治恐惧是自杀主因	239
附录	244
一 王国维史学活动编年	244
二 略论王国维与陈寅恪	262
整理后记	281

第一章 博综诸学露峥嵘

浙江杭州湾北岸，钱塘江口，有一座古老的著名城镇盐官镇，为清代海宁州治。此地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雨量充沛，物产丰富，民逐鱼盐为生，行者工舟楫，居者业稼穡纺织，是一个农业生产和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著名的海宁潮，蔚为天下奇观。每当潮水进入钱塘江，因江口急剧收缩，使潮水迅速抬高，“回薄激射，折而趋于两山之间，拗怒不息，则奋而上跻，如素霓横空，奔雷殷地”^①，从而出现了“烟云变幻，气象万千”的奇丽景色^②。海宁不仅有驰名天下的钱塘江潮，还是一个文化发达的地区，近三百年来，学者辈出，如康熙年间的陈莲宇，师事黄梨洲，提倡颜李之学，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道光、咸丰、同治年间，则有校勘学者张叔未（廷济）、蒋生沐（光照），光绪年间，则有著名算学家李善兰。以后更有张宗祥、蒋百里、钱崇澍等学者活跃于学界。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1877—1927年）就是在这块土地上，开始了他充满忧患的人生。晚清社会风雨飘摇的时势，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的冲突交融，在这位性格内向的学人心中激起过无数重波澜。社会之公理，人生之价值，这些问题曾朝夕萦回于其脑际，使他的生活、他的行踪、他的学术和思想，无不深深

① 《海宁州志》卷一。

② 《海宁州志》卷四。

刻下了那个风云变幻、多灾多难而又扑朔迷离的时代印记。当我们顺着他生命的最初足迹，再一次审视这位一代学者的身世遭际和巍巍学业时，思绪禁不住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

一 新旧杂陈的启蒙教育

1877年12月3日(清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王国维诞生于盐官镇双仁巷。他初名国桢，后改名国维，字静安(庵)，亦字礼堂，晚年所居名观堂，又号永观。其远祖是颇有文化修养的仕宦人家。史载他的远祖王稟，北宋末年以副都总管守太原，城陷遇难，赠安化郡王。其孙王沆由青州随南宋高宗南渡，赐第盐官。王沆之子王恕、孙王辉都是南宋的进士。王国维的曾祖父瀚、祖父嗣铎都是国学生，同时兼业行医^①。其父王乃誉，字与言，号莼斋，早年习贾于茶漆肆，后其肆自上海迁于海宁之硤石镇(今海宁市治)，后又在海宁县城经营京广杂货铺，是个中小商人知识分子。王国维在《先太学君行状》说，其父经营商业后，“始得于贸易之暇，攻书画篆刻诗古文辞。会戚属有令江苏之溧阳县者，延府君往佐之，前后凡十余年。由是遍游吴越间，得尽窥江南北诸大家之收藏。自宋、元、明、国朝诸家之书画，以至零金残石，苟有所闻，虽其主素不识者，必叩门造访，摩挲竟日以去。由是技艺大进。……君于书，始学褚河南、米襄阳，四十以后专学董华亭，识者以为得其神髓。画，无所不师，卒其所归，亦与华亭、娄东为近。”^②可以看出，其父王乃誉是一位博学多才、刻苦勤奋、力求

^① 《王乃誉日记》光绪二十六年正月条载：“吾家自吾祖吾父若父三世能医矣。”稿本，上海图书馆藏。

^② 王国维：《先太学君行状》，原件藏上海图书馆。

有所成就的人。他自溧阳县幕辞职归里后,虽然继续经营商业,但仍坚持“日临帖数千字,间于素纸作画”。他曾说:“光绪己丑,共临此帖(董书《孝经》)三十过,然了无所得,可见临池之难。”^①他这种精进不穷的治学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少年王国维,在父亲言传身教的影响下,王国维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基础。

王国维7岁开始就读于私塾潘紫贵(绶昌)先生处,接受传统的儒学启蒙教育。这时他的父亲仍在江苏溧阳县幕游,很少居住在海宁家里。潘紫贵先生遂成为王国维的第一位老师,学习内容自然是限于当时流行的私塾功课的范围。1887年,王国维改从陈寿田先生学习,其读书生活由启蒙时期进入第二阶段。这年正月,他的祖父嗣铎公去世,父亲自溧阳归里,从此居丧不出,在家教育子女。此时的王国维除了受到私塾老师的教育外,又受到父亲的严厉督促和教诲。

陈寿田先生比起潘紫贵先生来,在学养上又胜一筹。他是近代著名科学家、同县李善兰在总理衙门同文馆任天文算学教习时的学生。清末同文馆与一般书院不同,它主要是传授近代的科学文化知识,培养通译人才,其学员不仅精于经学,还需要学习一些近代的科学文化知识以及外语。王国维11岁时便在一位不仅精通经学,而且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的先生教育下,是十分难得的。幼小时的王国维,学习生活颇为繁忙。陈寿田先生对他月必课骈散文、古今体诗若干首,从而使他在国学方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王国维年轻时,由于天资聪颖和勤奋好学,进步异常迅速,“诗文艺早(已)洛洛成诵”,同时又涉猎家里的藏书。据《静安文集续编·自序》说:“家有书五六篋,除《十三经注疏》为儿时所不

^① 《王乃誉日记》。

喜外，其余之书，晚自塾归，每泛览焉。”勤奋的学习，使他扩大了视野，增进了知识，提高了治学的才能，所以到了15岁时（1891年），已经可以上下古今纵谈文史，校勘疑误，鉴别异同，间为词章，与友朋共同切磋。到了16岁那年，家中藏书已满足不了他日益增长的求知欲望，特别是在当时注重经世的时代学术思潮的影响下，他喜欢阅读史书。前引《自序》说：“十六岁，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所储蓄之岁朝钱万，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那时他对史籍不可能有深刻的理解，不过是在时代思潮的影响下，逐步形成自己的读史兴趣和志向，并与同辈好友褚嘉猷、叶宜春、陈守谦三君子上下议论，称“海宁四才子”^①。华裔学者叶嘉莹教授说：“虽然他在少年时代，未必便有如他在《国学丛刊序》中所叙述的对史学之意义与价值的深刻认识，可是他对于记述人类经验的历史有兴趣，又喜欢校勘考据，则其关心人世与追求真理之精神，却是从他幼年读书志趣中，便已可窥见一斑了。”^②这种少年时期培养起来的对史学的兴趣，与他后来成为一代史学大师有着前后相联的密切关系。

由于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正是清朝外朽内腐的时代，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下，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敏感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热忱，不仅表现在与帝国主义、封建保守势力进行直接的斗争上，而且更主要表现为要求学习西方、除旧布新、振兴中华的强烈改革愿望。自龚自珍、魏源以来，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时代思潮，这股思潮不断地、有力地震荡着王国维。16岁时，王国维一举考入州学，成为一名秀才。但他并无意于科

① 《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王哲安序》。

② 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2页。

举仕途,所谓“时方治举子业,又以其间学骈散文,用力不专,略能形似而已”^①。入州学的第二年,他虽然勉强参加了一次应举人试的考试,由于不喜欢帖括之学,故“应试不惬意”^②,未终场便归故里。因为王国维此时所感兴趣的只是史学、校勘与考据之学。正如其挚友陈守谦所说:“其时君专力于考据之学,不沾沾于章句,尤不屑就时文绳墨。故癸巳大比,虽相偕入闱,不终场而归,以是知君之无意于科名也。”^③可是,其父王乃誉对此十分不满,虽未加面责,但在4月9日(三月十三日)的日记中写到:“静儿杭(州)回,知考而未取,自不思振作,用功于平日,妄意自为无敌,及至临场数蹶,有弃甲曳兵之象。”1894年王国维就学于杭州崇文书院。这年再次应省试,又不中,颇受父亲斥责。王乃誉在5月29日(四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说:“责静儿,以不合借书画于人,并责其不用功,而心地未明白。此时极好机会,再不努力惜光阴以从事,后日何所望。于是老大伤悲,犹小无学业,无功力,不振家声,不能顾家处世,胥在此偷闲好逸,自是之弊耳,可不戒哉!”^④

1894年7月25日日本挑起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日本军舰不宣而战,向清海军发动突然袭击。不久以中国失败宣告结束,清政府签定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这次战争的失败,不仅把清王朝的“中兴”假象暴露无余,而且把洋务派的所谓“洋务新政”富国强兵的愿望化为泡影,使中国进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爱国志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联合在北京应试的各省举

① 《静安文集续编·自序》。

② 《王乃誉遗墨》。

③ 陈守谦:《祭王忠愍公文》。

④ 《王乃誉日记》。

人联名上书清廷,要求拒绝批准《马关条约》,并创办《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鼓吹维新变法。严复也在《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等文,要求赶快维新变法,废除八股文,改革封建专制制度等等。维新变法的思潮汹涌澎湃,冲击着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地处海宁的王国维也受其影响,正如他自己所说:“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者。”他极其向往和追求新学,但“家贫不能以费供游学,居恒怏怏”^①,心情极端苦闷。过去本来就不喜欢的举子之业,这时“更不能专力”,他所向往的是当时的新学,为此想方设法寻觅论述新学新政的书刊。如1896年2月18日(正月初六),《王乃誉日记》载:“见静(儿)案有《盛世危言》一部。”9月17日日记又载:“静(儿)借到《格致汇编》,急读之,颇有实用,寻宝录也。”王国维非常关心时事,经常阅读《时务报》,并带给父亲看。《王乃誉日记》说:“静(儿)持《时务报》第一、二册(归家),上海新设,七月初一日开馆,总理为汪穉卿,执笔新会梁启超,所陈通变议,颇洽时政,诚此时之要务。惟变法谈何容易,杞忧之。况藉措薪,疾首而大人君子未必听,(苟安一旦)必至万不可为,大事已去,乃思一死,此所以习固结,大愚不灵。”在《王乃誉日记》中,诸如此类的记载有不少。又如1897年12月7日(十一月十四日)记载:“静儿借到《时务报》四十五、六两册”,王乃誉迫不及待,连夜“烧烛观之,其谓中朝不能骤更新法,杂乱无章,恐迟延不达,则世界早变,奈何!”这说明父子两人都非常关心新学新政,忧国忧时成了他们共同的心声,因而时常互相传阅有关书刊,谈论读后观感,父子俩对维新思潮都产生了共鸣,于是王国维弃帖括而不为、绝举业而不就的做法,也就得到了父亲的谅解和支持,不再受到责难了。

^① 《静安文集续编·自序》。